PANORAMA SCHOLARLY GROUP

Rural Governance and Green Development



新时代下党建引领乡贤回引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Exploring the Pathways of Party Building-Led Return of Local Elite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宋云（Song Yun）[a,]*

[a] *中共三明市委党校，中国（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anming Municipal Committee, China）*
***DOI**: https://doi.org/10.63802/rggd.V1.2025.164*

ARTICLE INFO

***Keywords**:*
党建引领
乡贤回引
乡村振兴
路径
Party building-led governance
return of local eli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ways

ABSTRACT

乡村振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举措，人才振兴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本文聚焦党建引领乡贤回引这一核心主题，深入剖析其对乡村振兴的多元推动路径及深远实践意义。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访谈调查法与实证研究法，从组织建设强化、产业发展驱动、文化传承创新、生态环境优化及基层治理提升五大维度，系统揭示党建引领乡贤回引整合乡村资源、激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乡村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持与实践指引，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initiative vital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well-being, with talent revitalization playing a critical supporting ro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re theme of Party building-led return of local elites ("xiangxian")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multifaceted pathways and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y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ies, interview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explores five key dimensions: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driv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novating cultural heritage, optimiz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by which Party-led mechanisms for mobilizing local elites integrate rural resources, stimulat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reshape rural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findings offer sustainable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86-173-5052-3927; e-mail: xht960101@163com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征程中，乡村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核心瓶颈。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部分偏远农村地区人才流失率超 50%，直接导致乡村产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档、基层治理队伍力量薄弱等系列问题。党建引领乡贤回引作为破解乡村人才困境、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创新实践路径应运而生，兼具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研究可丰富拓展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深化对人才要素与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治理振兴协同发展关系的认知，填补党建引领与乡村人才回流深度融合领域的研究空白，为乡村振兴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从实践层面而言，该研究可总结各地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实践经验，梳理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为各地乡村精准制定引才政策、搭建聚才平台、激活用才效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南，对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学界聚焦人才要素与乡村发展的关联，形成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成果。在乡村精英治理领域，罗伯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指出，乡村社区精英可通过搭建信任网络、整合资源激活内生动力，其多元参与机制与激励体系为我国乡贤发挥桥梁作用提供借鉴（帕特南，2011）。在农业人才培育领域，速水佑次郎与弗农·拉坦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阐释了专业人才对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作用，日、韩的人才培育计划为我国本土人才与回引乡贤协同培育提供参考（速水佑次郎、拉坦，2000）。在人口迁移领域，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中“就业机会、发展空间影响迁移决策”的观点，及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理论中“人才素质与乡村发展相互促进”的论断，为分析乡贤回引动力机制、优化乡村引才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撑（英格尔斯，1985）。尽管中外制度、文化存在差异，但西方在乡村精英角色定位、人才吸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仍为我国提供了比较视野。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围绕乡村人才振兴形成多元研究维度。乡贤治理方面，贺雪峰指出新乡贤是衔接传统与现代治理的重要载体，可在矛盾调解、文化传承等领域发挥作用（贺雪峰，2016）；陈成文等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乡贤回引对治理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提出需搭建参与平台、明确权责边界（陈成文 & 张江龙，2021）。乡村人才回流方面，张勇等提出构建“政策红利+情感纽带”双驱动引才模式（张勇 & 李娟，2019）；李小云等强调人才生态是影响人才回流的关键，需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维度优化（李小云 & 杨宇，2020）。党建引领方面，刘祖云等阐释了党建引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政治与实践逻辑（刘祖云 & 李烊，2020）；王征兵强调党组织应在人才识别、培育、使用中发挥引领作用（王征兵，2022）。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已覆盖相关领域，但聚焦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系统性研究仍存不足：一是对三者互动关系的深度分析欠缺，作用机制解构不够精细；二是对政策协同体系、长效机制的研究零散，未形成系统解决方案；三是案例研究多侧重单一描述，缺乏深度剖析与共性提炼，需进一步深化研究以填补空白。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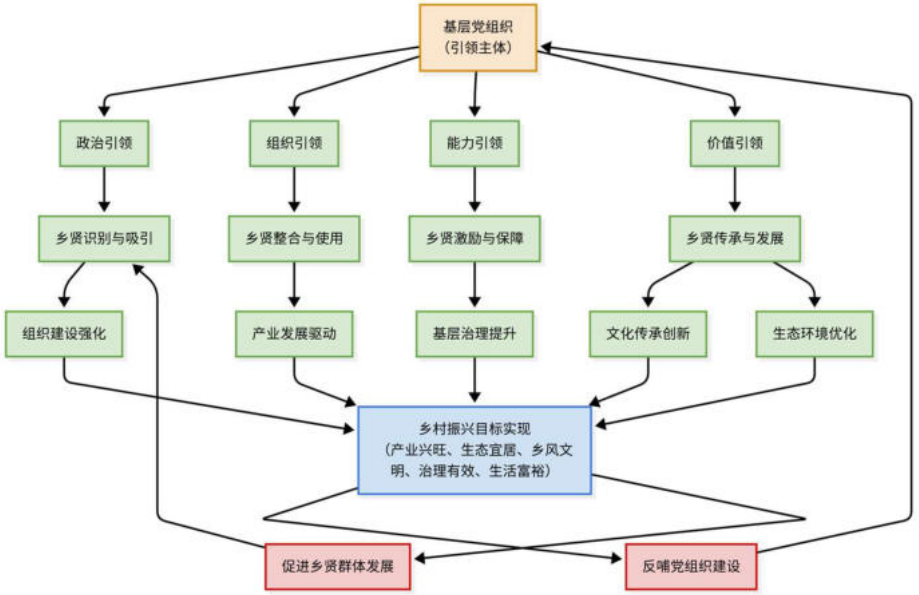
1.3.1.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一是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乡村振兴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相关文献，查阅党建引领、乡贤回引、乡村人才振兴领域的学术论文、专著、政策文件，构建研究理论框架，为论文分析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案例分析法，选取浙江、山东、福建、重庆等多地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典型案例，从案例背景、面临问题、实践举措、实施成效等维度进行深度剖析，提炼可复制、可推

广的实践经验；三是访谈调查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形式，采集乡村党组织干部、回引乡贤、村民代表等群体的一线经验数据，梳理党建引领乡贤回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境；四是实证分析法，结合各地统计数据、调研数据，量化评估乡贤回引对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的推动成效，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1.3.2. 创新点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内在逻辑，本文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图 1）。该模型表明，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引领者，通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于乡贤回引的全过程（包括识别吸引、整合使用、激励保障、传承发展），最终在组织、产业、文化、生态、治理五个维度上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同时，乡村的振兴成效又反哺于党组织的建设与乡贤群体的发展，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闭环系统。



[1]

图 1. 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路径机制模型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多维度、系统性的党建引领乡贤回引作用路径分析框架，深度解构党建引领、乡贤主体、乡村场域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清晰阐释乡贤资源、社会资本、政策支持、文化传统等要素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协同作用机制，为精准把握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实践本质提供全新视角；二是坚持跨学科研究视角，有机融合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深度挖掘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多元学科理论基础，突破单一学科研究局限，提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三是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实践中的焦点难题，针对性提出精准化、可操作的策略建议，聚焦人才识别对接、激励保障优化、长效发展机制培育、党建引领强化等核心环节，为破解乡村人才瓶颈、释放乡贤回引潜能提供实践路径创新范例。

2. 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理论基础

2.1. 马克思主义人才观

马克思主义人才观核心要义在于人才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才价值的实现需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高素质人才是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升级的

[1] 注：核心逻辑为“引领主体-引领维度-作用过程-目标维度-最终目标”的闭环系统。①引领主体：基层党组织是核心，通过政治引领（把握方向）、组织引领（统筹协调）、能力引领（赋能提升）、价值引领（凝聚共识）四大维度发挥作用；②作用过程：覆盖乡贤识别吸引、整合使用、激励保障、传承发展全链条；③目标维度：从组织建设强化、产业发展驱动、文化传承创新、生态环境优化、基层治理提升五个方面发力；④最终目标：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且振兴成效反哺党组织建设与乡贤群体发展，形成正向循环。

关键要素”，这一观点为乡村振兴中重视乡贤人才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2004）。在乡村振兴宏大语境下，乡贤群体作为乡村本土成长或外出发展后心系乡土的优秀人才，兼具丰富的知识技能、雄厚的资本资源、广泛的人脉网络与深厚的乡土情怀，涵盖商界精英、学界翘楚、技术达人、文化贤达等多元类型，是乡村发展不可或缺的特殊人才方阵。

乡贤回归乡村、参与乡村建设，精准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才价值创造、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论断，其凭借自身优势可在乡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治理优化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党建在乡贤回引与作用发挥过程中承担关键引领职责，如同“导航仪”与“指南针”，为乡贤施展才华精准锚定方向，确保乡贤人才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集聚，始终遵循社会主义发展价值导向。通过党组织的科学统筹协调，可将分散的乡贤个体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集体合力，有效破解乡村产业升级乏力、文化传承断档、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引领乡村经济社会迈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党建引领乡贤回引助推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理论根基。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乡村振兴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目标方向与实践路径，为党建引领乡贤回引工作提供根本遵循与行动纲领。这一理论强调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系统性振兴，需统筹推进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等多领域协同发展，而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需通过多元举措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策略的实施，与乡村振兴总要求各维度核心诉求高度契合：在产业兴旺层面，乡贤可依托资本实力、前沿技术与现代管理理念，精准对接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推动乡村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与新兴业态；在生态宜居维度，乡贤可引入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农业技术，助力乡村生态环境修复、绿色产业体系构建，推动乡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在乡风文明领域，乡贤作为乡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可深度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文明乡风与良好家风，重塑乡村文化自信；在治理有效层面，乡贤可充实乡村基层治理队伍，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凝聚力与服务效能，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生活富裕目标下，乡贤可通过带动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渠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党建引领乡贤回引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活实践，鲜明凸显了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地位，可有效凝聚全社会力量推动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3.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以信任、规范、网络为核心要素，强调社会资本可通过整合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合作效率，推动社会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该理论为解析乡贤回引的作用机制提供重要视角。乡贤群体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是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优势：在人际关系网络方面，乡贤既熟悉乡村本土人情世故，又与外界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可搭建乡村与外部沟通合作的桥梁，为乡村引入资本、技术、市场资源；在信任资本方面，乡贤凭借自身品德修养与社会威望，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公信力，可有效协调乡村矛盾纠纷、凝聚村民共识，提升乡村治理凝聚力；在规范资本方面，乡贤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可通过示范引领推动村民践行文明行为准则，优化乡村社会风气。

党建引领可进一步激活与放大乡贤社会资本价值：通过党组织统筹协调，可将分散的乡贤社会资本整合起来，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形成合力；依托党组织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可规范乡贤社会资本运用方向，确保其服务于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公益领域；通过搭建乡贤理事会、参事会等参与平台，可完善乡贤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推动乡贤社会资本与乡村公共资源高效对接，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3. 乡贤回引的实践模式与显著成效

3.1.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的情感驱动模式

3.1.1. 案例背景与面临问题

乡贤与乡村之间存在深厚的情感纽带，根植于乡村地域文化、家族传承与邻里关系之中。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乡贤外出发展，与家乡的联系逐渐弱化，导致乡村传统文化面临传承断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滞后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亟需通过情感唤醒机制激发乡贤回归意愿，推动其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浙江某村、徽州古村落等地即为典型代表，普遍面临文化载体破损、民俗活动式微、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制约了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

3.1.2. 实践举措

一是强化文化认同与归属感，激发情感召唤。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系统挖掘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唤起乡贤对家乡的情感记忆与文化认同。具体做法包括：修缮宗祠、古民居、牌坊等文化遗存，恢复乡村传统文化符号；定期举办祭祖仪式、民俗节庆、舞龙舞狮等传统活动；开展村史文化整理，梳理乡村历史人物、英雄事迹与传统技艺，编撰村志、建设村史展览馆，明确乡贤在村庄历史中的角色与贡献。例如，浙江某村投入专项资金修缮百年宗祠，按传统礼制举办庄重祭祖活动，并借助线上线下渠道向全球乡贤传播活动信息；徽州古村落由乡贤牵头成立文化保护协会，筹资修复古牌坊与祠堂，组织徽剧演出、徽派技艺展示，促进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二是搭建沟通平台，畅通乡贤与乡村的互动渠道。通过建立“乡贤信息库”系统梳理海内外乡贤的基本情况、行业分布与回乡意愿；定期组织座谈会、返乡考察等交流活动，邀请乡贤了解家乡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借助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持续推送乡村建设动态与文化传承成果，增强乡贤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1.3. 实施成效

情感驱动机制有效激发了乡贤回归热情，乡贤群体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文化保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基础设施方面**，通过乡贤捐资、资源协调等方式，推动道路建设提速。浙江、安徽等地依托该机制新建和升级乡村道路超 3 万公里，显著改善了农产品运输与居民出行条件。

(2) **教育发展方面**，各地乡贤设立教育基金累计超千万元，用于添置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教师。例如浙江某村的教育基金设立三年来，资助贫困学子 200 余人，奖励教师 50 余人，提升了农村教育发展质量。

(3) **文化传承方面**，传统文化载体得以修复与保护，民俗活动实现常态化开展。以徽州古村落为例，乡贤主导的文化保护行动每年吸引文化旅游游客超过 50 万人次，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重收益。

同时，乡贤广泛参与乡村事务，有效增强了村民凝聚力，促进邻里关系和谐，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村庄人文氛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与社会支持。

3.2. 政策激励与平台搭建的合力推动模式

3.2.1. 案例背景与面临问题

当前，乡贤返乡创业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产业基础薄弱、发展空间有限、政策支持不足，成为制约乡贤创业兴业的核心瓶颈。许多地区的乡村产业普遍存在同质化严重、技术水平低、市场对接难等问题，同时缺乏系统化的创业扶持政策与高效服务平台，导致乡贤返乡创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场地不足、技术支撑薄弱等多重挑战。因此，亟需通过政策激励与平台建设，形成聚才引才的系统合力，吸引乡贤群体积极返乡创业，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山东寿光、某县等地的实践中，乡村产业发展初期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如农业产业规模化程度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低，新兴文旅产业缺乏专业人才与资金支持，严重制约了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3.2.2. 实践举措

一是出台精准化扶持政策“组合拳”，有效降低创业门槛与成本。各地政府结合本地乡村产业发展实际，制定包括创业补贴、项目资助、税费减免、金融信贷支持在内的一揽子优惠政策。在资金支持方面，推行创业贷款免息或贴息政策，如某县

对乡贤返乡创业给予两年贷款免息支持，单个项目最高贷款额度达 500 万元；设立乡贤创业专项基金，对符合产业导向的项目提供 5 万至 50 万元不等的启动资金补贴。在场地支持方面，推行“租金三免两减半”政策，为乡贤企业提供低成本、稳定发展的生产经营空间。在税费减免方面，对乡贤创办的农业企业与文旅项目，三年内免征地方附加税费（如教育附加、水利基金等），并返还企业所得税的地方留存部分，显著减轻初创企业负担。

二是搭建多元化创业服务平台，提供系统化创业赋能支持。各地依托本地产业资源禀赋，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电商创业园、乡村众创空间等创业载体，集聚技术指导、市场对接与资源共享等服务功能。例如，山东寿光依托蔬菜主导产业建设国家级蔬菜产业园，引入农业科研机构设立技术服务站，为农业专家型乡贤提供技术研发与转化平台；同时，园区搭建农产品电商平台，对接大型商超与电商渠道，打通销售环节；设立资源共享中心，集成农业物资、冷链物流、品牌设计等资源，为乡贤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部分地区设立“乡贤创业服务专班”，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从项目策划到行政审批、政策咨询等全流程支持，显著提高创业效率与成功率。

3.2.3. 实施成效

该政策与平台合力推动模式有效激发了乡贤返乡创业热情，显著提升了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与效益:

(1) **在创业带动方面**，某县通过系统激励措施吸引百余名乡贤返乡创办农业科技、乡村旅游等企业 80 余家，新增就业岗位 2000 多个，带动农户人均年增收达 1.2 万元。

(2) **在产业升级方面**，山东寿光蔬菜产业园吸引 50 余名农业专家型乡贤入驻，推广精准温控、智能灌溉等技术 10 余项，选育蔬菜新品种 20 多个，构建起涵盖种植、加工、物流、品牌的全产业链体系，园区年产值由 50 亿元增长至 100 亿元，实现倍增。

(3) **在新兴业态培育方面**，乡贤创业助推乡村产业从初级粗放向深加工与品牌运营转型，农产品附加值提升 30%–50%。同时，电商、文旅、康养等新业态迅速发展，全国乡村电商年交易额突破 1 万亿元，乡村民宿数量五年增长两倍，带动新增就业逾千万人。

(4) **在辐射带动方面**，乡贤主导的产业园区发挥示范作用，推动周边乡村形成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集群，周边村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超过 15%，土地产出率提升 30%，有效增强了乡村产业的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

3.3. 党组织引领与示范带动的先锋引领模式

3.3.1. 案例背景与面临问题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承担着统筹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职责。然而，当前部分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引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乡村治理人才匮乏、产业发展缺乏带头人等问题较为突出。福建某村、重庆某镇等地曾面临类似困境：村级党组织班子结构老化、知识层次偏低，难以有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与治理创新；产业基础薄弱，村民缺乏增收路径；矛盾纠纷频发，治理效能亟待提升。在此背景下，通过强化党组织政治引领，充分发挥党员乡贤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重要路径。

3.3.2. 实践举措

一是发挥党员乡贤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基层党组织通过政策引导与情感动员，积极号召党员乡贤返乡任职或创业，发挥党性修养与先锋意识，引领乡村发展方向。在福建某村，党员乡贤响应组织号召，返乡流转土地 500 余亩，成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有机蔬菜产业。其深入田间地头向村民传授种植技术，并统一采购农资、规范产品质量、统一品牌销售，降低种植风险与成本。同时，拓展都市市场，与大型商超、社区团购平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产品稳定销售。此外，党员乡贤还积极参与乡村公益、移风易俗等事务，在公共事务中率先垂范，增强村民参与意识。

二是强化党组织精准对接服务，为乡贤返乡创业提供全链条保障。党组织深入调研村庄发展需求与乡贤资源禀赋，建立“乡贤资源—项目需求”动态对接机制，提升服务精准度。重庆某镇党委针对辖区文旅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的现实，精准对接文旅领域党员乡贤，引入文旅开发项目。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设立“绿色通道”与专项服务专班，安排专人负责用地规划、行政审批等协调事宜，有效缩短项目落地周期。面对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党组织主动牵头组织乡贤、村民代表与企业协商，制定公平合理的补偿与利益分配机制，及时化解争议。同时，定期组织党员乡贤参与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与能力提升活动，强化其服务群众与引领发展的综合素养。

三是构建党组织引领的协同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层党组织牵头设立乡贤理事会、参事会等协商组织，推动乡贤参与村务决策、监督管理与矛盾调解；通过建立“党组织+乡贤+村民代表”多方参与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围绕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讨，提升决策科学性与公众参与度。同时，充分利用乡贤的社会威望与人脉资源，协助党组织处理邻里纠纷与土地流转等敏感事务，推动乡村和谐发展。党员乡贤还积极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通过设立道德讲堂、乡贤文化长廊等载体，传承乡村伦理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

3.3.3. 实施成效

“先锋引领”模式有效提升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组织凝聚力与服务效能，推动乡村发展与治理双提升：

(1) **在产业发展方面**，福建某村有机农业合作社年产值突破千万元，有机果蔬成功进入都市高端市场，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 2 万元以上，激发了村民投身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重庆某镇文旅项目顺利落地，打造“古韵小镇”品牌，年接待游客超 5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2 亿元，带动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 5 万元增长至 50 余万元。

(2) **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党员乡贤返乡任职优化了党组织班子年龄与知识结构，增强了其服务群众与推动产业的能力，群众对党组织满意度超过 90%，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

(3) **在治理效能方面**，乡村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95%，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效果显著，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逐步形成，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了组织与治理基础。

4. 党建引领乡贤回引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路径

4.1. 组织建设强化：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党组织是党建引领乡贤回引工作的核心主体，强化乡村党组织建设可为乡贤回引与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主要通过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升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两大路径推进。

4.1.1. 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提升引领发展能力

乡贤群体兼具乡土情怀与发展能力，是充实乡村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各地通过吸纳乡贤进入乡村“两委”班子、实施后备干部培育计划，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知识与能力结构：在班子配备方面，拓宽选拔视野，优先选拔政治素质高、带富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返乡乡贤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或委员，中西部地区超 20%乡村已通过该方式吸纳年轻有为、经验丰富的乡贤进入“两委”班子，有效解决了乡村干部队伍老化、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升了乡村决策科学性与前瞻性；在后备干部培育方面，实施“乡贤+后备干部”培养计划，选拔优秀年轻乡贤、本土青年与乡贤结成帮扶对子，通过岗位锻炼、专题培训、导师帮带等方式，提升后备干部产业发展、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等能力，为乡村振兴储备骨干力量，增强干部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

4.1.2. 提升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整合乡村发展资源

乡贤凭借自身威望、人脉与资源优势，可协助党组织整合乡村分散资源、凝聚发展合力。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乡村夜校等平台，组织党员群众与乡贤开展学习交流、共商发展大计，增强党组织与村民、乡贤的联系，提升组织认同感与归属感；部分地区在党组织引领下，由乡贤牵头打造“红色党建联盟”，跨村整合产业、文化、生态等资源，联合开展产业协作、环境整治、文化联创等活动，打破村域发展壁垒，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党组织牵头建立乡贤联络站、服务站，健全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引导乡贤在公益事业、产业发展、矛盾调解等领域发挥作用，形成党组织引领、乡贤带动、村民参与的乡村建设格局，提升党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

4.2. 产业发展驱动：激活乡村产业振兴引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乡贤可凭借资本、技术、市场资源与管理经验，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业态，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主要通过特色农业产业化升级、新兴业态培育拓展两大路径实现。

4.2.1. 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乡村特色农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乡贤通过引入资本、技术与现代管理理念，推动特色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在规模化种植方面，乡贤牵头流转土地，成立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推行“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实现农业连片种植、统一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赣南脐橙产业通过该模式实现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超 200 万亩；在标准化生产方面，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质量管控体系，制定农产品生产标准，推广有机种植、绿色防控等技术，提升农产品品质，赣南脐橙产业建设智能果园，推行精准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实现脐橙品质标准化；在品牌化营销方面，打造区域公共品牌，通过电商平台、线下展会、新媒体宣传等方式，提升农产品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赣南脐橙品牌价值达百亿元，产业集群产值超千亿元，带动百万农民增收致富，彰显产业集聚与品牌效应价值。

4.2.2. 培育拓展乡村新兴业态，拓宽产业发展空间

随着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乡贤把握市场趋势，依托乡村资源优势培育乡村电商、民宿经济、康养农业等新兴业态，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在乡村电商领域，乡贤搭建电商销售平台，整合乡村农产品资源，通过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全国乡村电商年交易额破万亿元，有效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在民宿经济领域，乡贤挖掘乡村生态、文化资源，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特色民宿，融合休闲度假、文化体验、户外运动等功能，浙江莫干山乡贤打造民宿集群，形成全域旅游新业态，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旅游收入达百亿元，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典型范例；在康养农业领域，乡贤依托乡村生态环境优势，发展休闲农业、康养民宿、农事体验等项目，满足城市居民休闲康养需求，带动乡村第三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开辟新路径。

4.3. 文化传承创新：厚植乡村振兴文化根基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乡贤作为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可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文明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主要通过传统文化复兴弘扬、现代文明培育践行两大路径推进。

4.3.1. 复兴弘扬乡村传统文化，守护乡村文化根脉

乡贤牵头开展乡村传统文化挖掘、保护与活化工作，传承乡村文化基因：在文化载体保护方面，筹资修缮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等乡村历史建筑，恢复乡村传统文化空间，徽州古村落乡贤筹资千万元修复古牌坊 10 余座、古祠堂 5 座，保护乡村历史风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组织非遗传承人开展技艺教学，培育非遗传承后备力量，复兴徽剧、徽雕、剪纸等传统技艺，徽州古村落定期举办徽剧表演、徽雕技艺展示活动，推动非遗文化活态传承；在乡村历史文化挖掘方面，梳理乡村历史故事、英雄事迹、民俗风情，编纂村志、建设村史展览馆，打造乡贤文化长廊，浙江某村通过挖掘村史文化，整理出乡村发展历程与乡贤事迹，编纂村志 3 卷，建设村史展览馆 1 座，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在文化活动开展方面，举办民俗文化节、祭祖大典、传统节庆等活动，营造传统文化传承氛围，激活乡村文化活力，吸引游客与文化学者到访，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协同推进。

4.3.2. 培育践行现代文明，优化乡村社会风气

乡贤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传播现代文明理念与价值观，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在移风易俗方面，牵头制定村规民约，规范“红白喜事”办理流程，推动“红白喜事”简办、薄办，反对铺张浪费、封建迷信，北方某村乡贤推动修订村规民约，明确“红白喜事”礼金上限与办事规模，每年为村民节省开支超百万元，节省资金用于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在文明实践方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载体，开展文明家庭评选、科技文化下乡、志愿服务等活动，提升村民文明素养与科学文化水平，北方某村每年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活动，表彰先进家庭50余户，开展科技培训、文化演出等活动20余场；在道德教化方面，设立道德讲堂、乡贤讲堂，邀请乡贤分享道德故事、创业经历，传播正能量，湖南某村乡贤设立“道德银行”，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文明创建、公益事业可积累道德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激发村民向上向善内生动力，推动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相融共生，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文明力量。

4.4. 生态环境优化：绘就乡村生态宜居画卷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乡贤可引入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技术，推动乡村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打造生态宜居乡村，主要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两大路径实现。

4.4.1.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农业绿色转型

乡贤引领乡村农业从传统粗放式种植向绿色生态式发展转型，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在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引入有机肥料、生物防治、精准灌溉等绿色农业技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保护乡村土壤与水资源，西南山区乡贤引领发展生态茶园，推广有机种植技术，套种花卉、药材，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 60%，提升茶园生态质量；在循环经济模式发展方面，发展稻田养鱼、林下种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循环农业模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西南山区茶园通过套种花卉药材，吸引蜜蜂授粉，提升茶叶品质，同时花卉药材可增加收入，茶园亩均综合收益提升 50%；在绿色产业体系构建方面，培育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品牌，通过绿色认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西南山区生态茶园产出的茶叶获得有机认证，市场价格较普通茶叶提升 2 倍，实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守护乡村绿水青山，筑牢乡村生态屏障。

4.4.2. 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生活品质

乡贤参与乡村生态规划与环境整治，完善乡村生态基础设施，打造生态优美、生活便捷的乡村环境：在乡村规划方面，乡贤凭借专业知识或资源优势，参与乡村生态规划设计，保留乡村自然风貌，避免大拆大建，江苏某水乡古镇乡贤牵头制定乡村生态规划，依托水乡河道资源构建水生态景观网络；在环境整治方面，投资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垃圾集中处理系统，开展河道清淤、村庄绿化美化等工作，江苏某水乡古镇乡贤投入 500 万元建设污水处理站 2 座、垃圾中转站 1 座，清淤河道 10 公里，修复河岸生态 20 公里，种植绿植 10 万余株；在生态景观打造方面，建设生态景观步道、乡村公园、水生植物园等生态休闲空间，提升乡村生态颜值，江苏某水乡古镇打造生态景观步道 5 公里、乡村公园 3 座，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景观，发展水乡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超 30 万人次，乡村生态环境与生活品质显著提升，成为生态宜居乡村典范。

4.5. 基层治理提升：构建乡村善治崭新格局

基层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乡贤可搭建沟通桥梁、参与乡村治理，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主要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德治教化引领两大路径推进。

4.5.1. 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升治理效能

乡贤凭借人脉资源与公信力，架起政府、村民、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推动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架构：在治理组织搭建方面，在党组织引领下成立乡贤理事会、参事会等自治组织，明确乡贤在村务决策、监督、矛盾调解中的职责，广东某村成立乡贤理事会，吸纳商界、学界、技术界乡贤 20 余人，参与乡村治理；在村务决策方面，建立“党组织+乡贤+村民代表”协商决策机制，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经三方协商讨论后再决策，广东某村通过协商决策机制，确定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方案，保障决策科学性与民意性；在矛盾调解方面，乡贤协助党组织调解土地流转、邻里纠纷、劳资矛盾等问题，广东某村乡贤理事会成立以来，协调企业与村民土地流转矛盾 30 余起，化解邻里纠纷

50 余起，累计化解各类矛盾 80 余起，调解成功率达 98%；在监督管理方面，乡贤参与村务公开监督、集体资金使用监督，确保村务透明规范，广东某村乡贤理事会定期检查村务公开情况、集体资金使用账目，推动村务管理规范化，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与村民满意度。

4.5.2. 强化德治教化引领，涵养和谐村风

乡贤以自身品德修养与行为示范，引领乡村道德风尚，为乡村治理注入德治灵魂：在道德示范方面，乡贤以身作则践行道德准则，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帮扶困难群众，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湖南某村乡贤带头参与志愿服务，帮扶贫困学子 10 余人、困难家庭 20 余户，带动村民参与公益活动；在道德传播方面，打造乡贤文化长廊、道德讲堂，展示乡贤先进事迹与道德故事，邀请乡贤开展道德宣讲，传播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湖南某村建设乡贤文化长廊 30 米，开展道德宣讲活动 15 场，覆盖村民 800 余人次；在激励引导方面，通过设立道德银行、评选道德模范、乡贤榜样等方式，激发村民向上向善内生动力，湖南某村“道德银行”累计发放道德积分 1 万余分，兑换生活用品 500 余件，评选道德模范 30 余人，村民文明素养显著提升，文明乡风与和谐村风日益浓厚，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5. 党建引领乡贤回引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5.1. 人才识别与精准对接难题

5.1.1. 人才评价标准模糊，引才质量参差不齐

乡贤群体范畴宽泛、来源多元，涵盖商界精英、学界专家、技术人才、文化贤达、返乡创业能手等各类群体，其能力素质、专长领域、资源优势存在显著差异，既有具备专业技术的农业、文旅、生态领域人才，也有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与本土资源的乡村能人。但当前乡村乡贤人才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缺陷，评价标准较为模糊且侧重学历、资历等显性指标，以文凭、职称、从业年限作为核心衡量依据，严重忽视乡贤实践操作能力、乡土情怀、社会威望、资源整合能力等关键隐性要素，导致人才评价与乡村发展实际需求脱节。在农业生产领域，部分实操经验丰富、擅长将本土农法与现代技术结合、能有效提升农产品产量与品质的乡村老农，因学历较低、无专业职称，难以被纳入乡贤人才库；在乡村文旅规划领域，熟悉乡村文化内涵、创意能力突出、擅长挖掘乡村特色文化价值的本土文化爱好者，因缺乏官方认可的资质证书，难以获得参与乡村文旅项目开发的机会。这种不合理的评价标准，导致真正契合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需求的乡贤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部分不符合乡村发展需求的人员反而凭借学历、职称优势被认定为乡贤，造成人才引进质量参差不齐，削弱了乡贤回引对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效能，阻碍乡村产业升级、文化创新、生态优化等发展进程。

5.1.2. 供需匹配精准度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动态化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在产业发展初期，需农业技术人才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产业发展中期，需经营管理、市场运营人才拓展产业链与市场渠道；产业发展成熟期，需创新型人才培育新兴业态。生态建设领域需环境工程技术人才、生态规划人才；文化传承领域需非遗传承人、文化创意人才；基层治理领域需矛盾调解、公共服务人才。但当前乡村人才供给与需求对接存在明显错位，一方面乡村人才需求信息缺乏系统梳理，未形成标准化需求清单，需求表达模糊；另一方面乡贤人才供给信息零散无序，散布于个人交际圈、社交网络、行业论坛等渠道，缺乏统一、权威的人才资源整合平台，乡贤基本信息、专长领域、回乡意向等数据难以有效归集。同时，供需对接渠道单一梗阻，主要依赖乡村党组织人际推荐、政府部门有限公告等传统方式，缺乏常态化、精准化对接机制，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部分乡村计划发展文旅产业，却引入传统农业种植技术人才，导致人才闲置浪费；部分乡贤擅长农产品电商运营，却对接至缺乏电商发展基础的乡村，难以发挥自身优势，既降低了人才资源配置效率，又延误了乡村发展时机，制约乡村振兴进程。

5.2. 激励保障机制待完善

5.2.1. 政策协同性不足，激励效果大打折扣

各地虽纷纷出台乡贤回引相关优惠政策，但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部门协同联动不足，难以形成引才聚才合力。一是政策制定缺乏统筹规划，财政、农业、人社、金融、自然资源等部门各自出台政策，政策目标、实施标准、保障措施缺乏衔接，部分政策存在重叠冲突，如农业部门出台的乡贤创业补贴政策与人社部门就业扶持政策，补贴对象、申请流程不一致，增加乡贤政策享受难度。二是政策协同执行力度不足，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协调机制，政策执行各自为战，如创业扶持政策与金融信贷政策脱节，乡贤虽可享受创业补贴，但申办创业贷款时需满足严苛抵押担保要求，金融机构仅依据自身风险评估体系审核，未充分结合创业政策评估项目潜力与乡贤能力，导致乡贤创业资金缺口难以填补；税收减免政策与土地政策失配，乡村产业用地指标紧张，审批流程冗长复杂，部分乡贤文旅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因用地审批滞后，无法及时落地，税收减免政策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政策协同性不足导致政策激励效果大幅削弱，乡贤创业发展面临多重阻碍，创业热情受挫，制约乡村产业多元化、规模化发展。

5.2.2. 保障措施乏力，人才留存难度较大

乡贤回归乡村后，在生活保障、职业发展、社会融入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保障措施不足导致乡贤扎根乡村意愿不强。一是生活保障条件滞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差距较大，部分偏远乡村交通不便、网络信号差、水电供应不稳定，生活设施简陋；优质教育、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城镇，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落后，乡村医院医疗设备不足、专业医护人员短缺，乡贤子女教育、家人医疗保健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生活质量受影响，增加乡贤后顾之忧。二是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乡村产业体系不完善，产业层次偏低，以农业种植、简单农产品加工为主，企业规模小、产业链短，乡贤职业晋升渠道狭窄；乡村缺乏专业培训资源，乡贤难以获得新知识、新技能培训机会，专业能力提升受限，职业发展动力衰减。三是社会融入难度较大，乡村社交网络相对封闭保守，部分村民存在排外心态，对返乡乡贤缺乏信任，认为乡贤返乡是“谋取利益”，在项目合作、村务参与中存在抵触情绪；乡贤与村民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沟通交流存在障碍，难以快速融入乡村生活，影响乡贤与村民合作成效，削弱乡贤扎根乡村的决心，导致部分乡贤短期返乡后因保障不足、融入困难选择再次离开，人才留存率偏低。

5.3. 长效发展机制缺失

5.3.1. 短期行为倾向明显，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部分乡贤返乡动机具有功利性，缺乏长期投身乡村振兴的规划与决心，短期行为突出。一是盲目跟风创业，部分乡贤未深入调研乡村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仅追逐短期政策红利或热门产业趋势，盲目上马项目，如乡村旅游热时，大量乡贤仓促投资建设民宿，缺乏特色规划、市场定位模糊、运营管理能力不足，导致民宿淡季闲置率高、经营亏损，多数项目短期夭折；部分乡贤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未充分考虑原材料供应、市场销售渠道，项目投产后面临原材料短缺、产品滞销问题，难以持续运营。二是重形式轻实效，部分乡贤受政绩导向影响，热衷打造“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如过度修建乡村景观、文化设施，忽视设施实用性与维护成本，部分乡村景观建成后因缺乏维护闲置废弃；部分乡贤开展公益事业仅注重宣传造势，未解决村民实际需求，如捐赠物资未精准对接贫困村民，公益活动流于形式。短期行为导致乡村发展缺乏持续动力，资源错配浪费严重，破坏乡村生态文化肌理，扰乱乡村振兴长远规划，阻碍乡村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稳健增长。

5.3.2. 传承接续困境突出，人才梯队建设滞后

当前乡贤回引工作主要依赖乡贤个体乡土情怀、人脉资源与个人意愿维系，缺乏系统性、常态化的人才梯队建设与传承机制，乡贤队伍面临断档风险。一是初代乡贤退出风险加剧，现有回引乡贤多为中年群体，随着年龄增长，体力、精力逐渐衰退，部分乡贤因年迈体弱、事业变故需退出乡村建设，而其负责的产业项目、公益事业、治理工作缺乏合适接班人，易出现项目停摆、工作中断情况，如某村乡贤牵头的有机农业合作社，因乡贤年迈退出，缺乏懂技术、善管理的接班人，合作社经营效益大幅下滑，带动农户增收能力减弱。二是本土青年人才培育不足，乡村本土青年人才培育体系残缺，缺乏针对性培育计划，农业技术传承、乡村治理经验传递仅依赖口头传授，无规范渠道与长效机制；乡村缺乏吸引本土青年留乡发展的环境与平台，部分本土青年虽有留乡意愿，但因乡村产业发展空间有限、职业发展机会少选择外出务工，本土青年人才储备匮乏，

难以承接初代乡贤事业。三是二代乡贤吸引难度大，二代乡贤多在城市成长生活，对乡村归属感与认同感较弱，乡村缺乏针对二代乡贤的吸引激励机制，难以引导二代乡贤返乡接力，乡贤队伍传承接续面临严峻挑战，削弱乡村振兴发展连贯性与稳定性，危及乡村振兴战略持久推进。

6. 优化党建引领乡贤回引助推乡村振兴的策略建议

6.1. 精准识别与靶向对接，优化人才配置

6.1.1. 构建科学人才评价体系，精准筛选优质乡贤

摒弃传统单一学历、资历导向评价模式，建立契合乡村发展需求的多元化乡贤人才评价体系，实现精准识才。一是明确评价指标维度，综合考量乡贤品德素养、专业技能、实践经验、乡土情怀、资源优势与贡献潜力六大核心指标：品德素养侧重考察乡贤诚信品质、社会责任感、群众认可度；专业技能涵盖农业技术、经营管理、文旅创意、生态环保、基层治理等多领域专长；实践经验以乡贤过往项目成果、创业经历、服务乡村案例为核心；乡土情怀考察乡贤对乡村的情感认同、奉献意愿；资源优势评估乡贤资本、人脉、技术、市场等资源整合能力；贡献潜力结合乡村发展需求，预判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能力与空间。二是创新评价方法，采用量化评分、实地考察、业绩评估、群众评议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量化评分按指标权重制定评分细则，对乡贤各维度能力打分；实地考察深入乡贤工作场景、乡村实地，核实乡贤实践能力与项目成效；业绩评估依据乡贤过往创业成果、公益贡献、治理成效等量化数据判定；群众评议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方式，收集村民对乡贤认可度与评价。三是建立动态人才库，依托大数据技术搭建乡贤人才信息管理平台，录入乡贤评价数据、专长领域、回乡意向等信息，按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等领域分类管理，实时更新乡贤信息，根据乡村发展需求变化调整人才库，确保人才库动态适配乡村振兴需求，精准筛选出真正契合乡村发展的优质乡贤。

6.1.2. 强化供需双向精准对接，破解资源错配难题

搭建多元化供需对接平台，完善对接机制，实现乡贤人才供给与乡村需求精准匹配。一是梳理标准化供需清单，乡村党组织深入调研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传承、基层治理等领域需求，按短期、中期、长期需求分类，制定细化、明确的人才需求清单，明确人才专业领域、能力要求、岗位职责；乡贤人才通过信息平台填报个人专长、回乡意向、服务领域，形成标准化人才供给清单，实现供需信息清晰化。二是搭建一体化对接平台，整合政府部门、乡村党组织、高校、社会组织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乡村人才供需大数据对接平台：线上平台设置需求发布、人才推荐、项目对接、政策咨询等功能，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供需智能匹配，定期开展线上人才招聘会、项目对接会，采用直播推介、视频洽谈等形式，打破时空限制；线下组建供需对接专班，组织乡贤实地考察乡村，深入了解乡村发展现状与需求，举办线下供需对接座谈会，推动供需双方面对面沟通，精准对接合作项目。三是推行“订单式”人才培育与引进，乡村依据产业发展规划与人才需求清单，与高校、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签订人才培育协议，定向培育农业技术、文旅运营、乡村治理等专业人才，如针对特色农业发展需求，定制农业科技人才培育课程，为乡村提前储备人才；针对乡村紧急人才需求，通过对接平台定向引进专业乡贤人才，签订“订单式”服务协议，明确服务内容、成效目标与保障措施，确保人才供给与乡村需求无缝衔接，从根源解决供需失衡问题。

6.2. 完善激励保障体系，强化发展支撑

6.2.1. 加强政策协同联动，形成引才聚才合力

打破部门壁垒，构建统筹协调、协同高效的政策体系，提升政策激励实效。一是建立政策统筹机制，成立由党委政府牵头，财政、农业、人社、金融、自然资源等部门参与的乡贤回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制定乡贤回引政策规划，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避免政策碎片化；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协调解决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衔接问题，确保政策目标一致、标准统一、流程顺畅。二是优化政策协同内容，推动各领域政策深度融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财政部门设立乡贤创业贷款贴息专项基金，金融部门创新“乡村振兴创业贷”产品，依据乡贤项目前景、信用等级灵活设定授信额度、利率与还款周期，简化

贷款审批流程，取消不必要抵押担保要求，解决乡贤创业资金难题；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协同，自然资源部门优先保障乡贤产业项目用地指标，简化用地审批流程，推行“用地预审+规划许可”并联审批，缩短审批周期；税收部门对乡贤产业项目按项目带动就业规模、生态效益实行差异化税收减免，对用地集约型项目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三是强化政策落实保障，建立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由乡贤回引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督查政策落实情况，及时发现解决政策执行中的梗阻问题；设立政策咨询与投诉热线，为乡贤提供政策解读服务，受理乡贤政策落实投诉，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形成“政策组合拳”，提升乡贤回引激励力度。

6.2.2. 健全全方位保障机制，增强乡贤扎根意愿

从生活保障、职业发展、社会融入等维度完善保障措施，为乡贤扎根乡村提供坚实支撑。一是优化生活保障条件，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大乡村交通、水电、通信设施投入，推进农村道路硬化、网络全覆盖，提升乡村生活便利性；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建设乡贤人才公寓，依据乡贤家庭结构设计户型，配备完善生活设施；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城镇优质学校与乡村学校结对帮扶，开展远程授课，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升级乡村医疗设施，建立乡村医院与城镇三甲医院远程会诊机制，引进专业医护人员，解决乡贤子女教育、家人医疗难题。二是拓宽职业发展空间，搭建乡贤能力提升平台，定期组织乡贤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参加行业培训、挂职锻炼，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技术研发，提升乡贤专业能力与创新水平；建立乡贤晋升激励机制，设立乡村振兴贡献奖，依据乡贤产业带动、公益服务、治理成效等贡献等级，授予荣誉称号、赋予项目决策权，推荐优秀乡贤参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升乡贤社会地位；支持乡贤创业企业做大做强，为乡贤产业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市场对接服务，助力乡贤拓展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拓宽职业发展渠道。三是促进乡贤社会融入，搭建乡贤与村民互动平台，组织乡贤参与乡村志愿服务、民俗活动、公益事业，增进乡贤与村民感情；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培育开放包容的乡村文化氛围，引导村民转变观念，消除排外心态，增强对乡贤的信任与认可；建立乡贤融入帮扶机制，由乡村党组织干部、村民代表与乡贤结对，帮助乡贤熟悉乡村情况、融入乡村生活，提升乡贤归属感与认同感，稳固乡贤扎根乡村决心。

6.3. 培育长效发展机制，厚植振兴根基

6.3.1. 引导树立长远发展理念，摒弃短期功利思维

通过思想引导、规划指导、案例示范等方式，引导乡贤树立长期投身乡村振兴的理念，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一是强化思想教育引导，定期举办乡村振兴战略研讨班、乡贤发展论坛，邀请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解读乡村振兴政策导向、长远规划，帮助乡贤明晰乡村振兴战略意义与发展方向；组织乡贤学习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如陕西袁家村文旅融合模式、山东寿光现代农业模式，分享长期深耕乡村的成功经验，提升乡贤战略眼光与责任担当，摒弃短期功利心态。二是加强发展规划指导，乡村党组织牵头，联合乡贤、村民代表、专业机构，结合乡村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趋势，制定乡村 5-10 年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各阶段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引导乡贤依据乡村长期规划，结合自身优势制定个人事业发展规划，将个人创业项目与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如依托乡村特色农产品优势，打造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培育乡村特色品牌，避免盲目跟风创业。三是建立项目长效评估机制，制定乡村建设项目长效评估标准，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等维度对乡贤项目进行全程评估，对短期功利性项目、“政绩工程”予以规范引导，优先支持契合乡村长期发展规划、具有可持续性的项目；建立项目跟踪服务机制，为乡贤项目提供长期技术、市场支持，助力项目持续运营，推动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6.3.2. 完善传承接力机制，构建人才梯队体系

建立系统性乡贤人才传承机制，破解人才断档难题，确保乡贤队伍薪火相传。一是实施初代乡贤传帮带计划，组织初代乡贤与本土青年人才、二代乡贤结成帮扶对子，明确传帮带内容与目标，初代乡贤向接班人传授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乡村治理方法与乡土情怀，通过岗位历练、实践操作、案例讲解等方式提升接班人能力；建立传帮带激励机制，对成效显著的初代乡贤给予荣誉表彰、政策奖励，如优先享受创业扶持、授予“乡村振兴导师”称号，激发初代乡贤传帮带积极性。二是加强本土青年人才培育，依托职业院校、农业技术推广站、乡村夜校等载体，建立分层分级本土青年人才培育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青年制定定制化培育课程，涵盖农业技术、电商运营、乡村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搭建本土青年人才

实践平台，安排青年人才参与乡贤产业项目、村务管理、公益事业，在实践中提升能力；设立本土青年人才扶持基金，对留乡创业、参与乡村建设的本土青年给予资金补贴、项目扶持，吸引本土青年留乡发展。三是吸引二代乡贤返乡接力，建立二代乡贤信息库，梳理二代乡贤成长背景、专业领域、职业规划，通过乡情联谊活动、乡村实践体验、政策宣讲等方式，增强二代乡贤对乡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制定二代乡贤返乡激励政策，对二代乡贤返乡创业给予创业补贴、税收减免、项目优先扶持，对返乡就业给予职业发展指导、薪资补贴，引导二代乡贤返乡承接初代乡贤事业，补充乡贤队伍力量，构建“初代乡贤引领、本土青年成长、二代乡贤接力”的人才梯队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6.4. 强化党建核心引领，凝聚振兴合力

6.4.1. 提升党组织引领能力，夯实领导核心地位

强化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对乡贤回引与乡村振兴的统筹引领能力，筑牢党建引领根基。一是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拓宽选拔视野，从返乡乡贤、致富能手、大学生村官、优秀党员中选拔政治素质高、带富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人员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优化党组织班子结构；定期组织党组织班子成员参加政治理论、产业发展、治理能力等专题培训，提升班子整体素质与领导能力，确保党组织精准把握乡村振兴方向。二是发挥党组织资源整合优势，党组织牵头整合政府部门、企业、高校、社会组织资源，为乡贤回引提供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支持；统筹规划乡村人才布局与产业项目，依据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重点领域需求，合理安置乡贤人才，避免人才资源分散；协调解决乡贤回引与作用发挥中的重大问题，如跨村乡贤资源整合、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复杂矛盾纠纷调解，凝聚乡村发展合力。三是强化党组织思想引领作用，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政策宣讲会，向乡贤、党员、村民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凝聚思想共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乡贤树立服务乡村、奉献乡村的理念，引领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保乡村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6.4.2. 构建协同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格局。一是明确乡贤参与治理权责边界，制定《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章程》，规范乡贤参与村务决策、监督、矛盾调解、公益服务等工作的范围与程序，明确乡贤在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避免乡贤过度参与或参与不足，确保乡贤参与治理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健全协商决策机制，完善“党组织+乡贤+村民代表+企业”四方协商决策机制，依据事项重要性、紧急程度分级分类协商，乡村产业发展规划、集体资产处置、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事项，经四方充分协商讨论后，按民主程序表决；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乡村发展情况，听取乡贤、村民代表、企业意见建议，共同破解乡村发展难题，提升决策科学性与民意性。三是组建乡贤专项服务团队，依据乡贤专业优势，组建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矛盾调解专项服务团队：产业发展团队负责乡村产业规划、项目策划、技术指导；文化建设团队负责传统文化挖掘、文明乡风培育、文化活动开展；生态保护团队负责生态规划、环境整治、绿色技术推广；矛盾调解团队负责乡村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协同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与全民参与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7. 结论

党建引领乡贤回归，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策略。其凭借多元路径，为乡村发展全面赋能，在组织建设、产业繁荣、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治理优化等方面展现独特效能，取得显著成绩。然而，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人才匹配难、激励保障不足、持续发展挑战等难题，需精准施策、机制创新、党建深化，以攻克难关、释放潜力、巩固基础，推动乡村迈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贤回归前景广阔。应紧跟时代步伐，深化制度创新，拓宽引才渠道，提升人才素质，培育新型乡贤队伍，注入乡村振兴新动能。同时，借助数字化智能化力量，打造智慧乡村治理体系，拓展“互联网+乡村振兴”新业态。强化党建引领，深植乡土文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蓝图，实现乡村产业繁荣、生态优美、文化振兴、治理优化、百姓富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贡献声明

宋云（男），中共三明市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室讲师，本文由作者独立完成，涵盖选题设计、资料收集、理论分析、案例撰写、结构安排及全文修改，相关研究观点及结论均由作者本人提出与负责。

遵守伦理声明

无须伦理审查。

资金来源声明

无。

竞争利益声明

作者声明，依其所知，在本稿件所述研究工作中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的经济、个人或专业关系。

致谢

无。

参考文献

书籍类：

1. 马克思 (2004). 资本论（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罗伯特·帕特南 (2011).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潘忠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3. 速水佑次郎, 弗农·拉坦 (2000). 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英格尔斯 (1985). 人的现代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5. 习近平 (20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期刊文章类：

6. 贺雪峰 (2016). 新乡贤与乡村治理. 探索与争鸣, (2), 56–61.
7. 李培林 (2018).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农村发展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 (1), 4–20.
8. 李小云, 杨宇 (2020). 乡村人才生态优化与乡村振兴. 中国农村经济, (3), 23–35.
9. 刘祖云, 李烊 (2020). 党建引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湖北社会科学, (7), 45–51.
10. 王春光 (2018). 新乡贤与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 社会学研究, (2), 192–210.
11. 王征兵 (2022). 乡村人才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45–52.
12. 吴理财 (2017). 乡贤治理与乡村振兴：价值、困境与出路. 探索, (6), 126–132.
13. 张玉林 (2020). 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困境与出路. 中国农村观察, (2), 2–12.
14. 张勇, 李娟 (2019).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才回流的困境与对策. 农业经济问题, (8), 78–85.
15. 周批改 (2021). 党建引领乡贤回引的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 中州学刊, (3), 74–79.
16. 陈成文, 张江龙 (2021). 乡贤回引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机理与路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 67–74.
17. 陈文胜 (2017 年 5 月 15 日). 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光明日报, (6).
18. 叶敬忠 (2018). 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探索. 中国农村经济, (1), 2–16.

政府/报告类：

1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20. 农业农村部 (2023). 2023 年全国农村人才发展报告. 北京: 农业农村部.